

中国的民族主义、革命与经济改革： 对非洲的启示

克维西·卡瓦·普拉

内容提要 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出发,本文试图将非洲和中国作为两个整体的实体来加以比较。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的勃兴和民族国家的统一、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对于中国的进步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并且也在更宏大的国际背景下对非洲大陆的革命和发展道路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现代的新文化运动,更具体地说是白话文运动,产生了中国协调一致的语言形式,推动了读写能力的普及以及语言、文学和大众社会之间的交汇,对于中国进步和发展的作用同样十分明显。从语言和读写能力发展的历程来看,中非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只有取得废除殖民地语言、推广非洲语言的斗争的胜利,才能实现非洲人民的解放和发展。

关键词 中国 非洲 统一 民族民主革命 白话文运动 非洲语言

本文试图将非洲和中国作为两个整体的实体来加以讨论,尽管目前两者都不是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而存在的。中国大陆需要解决好台湾问题,而非洲则是被分为 50 多个国家,这些处于新殖民主义环境中的非洲国家之间缺乏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抑或团结的精神。中国是一个拥有超过 13 亿人口的国家,非洲的人口数量

* 克维西·卡瓦·普拉(Kwesi Kwaa Prah),南非开普敦非洲社会高级研究中心主任。

** 本文原发表于由非洲社会高级研究中心(CASAS)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共同主办的“中非关系:过去、现在与未来”学术研讨会(南非:约翰内斯堡,2005 年 11 月 23—25 日)。原文述及作者对中国的观感,并且作为对中国和非洲进行比较分析的“背景”,以较大篇幅概述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变革历程。限于篇幅,并征得作者同意,本文刊发原文的“比较”部分。——编者

仅是中国的一半左右。从地理面积上讲,非洲地域辽阔,是世界上第二大的大陆板块,可同时包容印度、西欧、美国大陆部分和中国,因而非洲的人口密度比中国要低得多。这是本文所关注的这两个整体的一些特点。

在中国和非洲两者的经历中,有很多显而易见的可比较的结构和体制。几乎在所有方面,这些比较点都有很大的差别。当我们考虑到向现代化转变的先决条件时,这些差别总是无一例外地表现为非洲在这一过程中的不足。但是,这些差别也显示出非洲在哪些方面的特色可以对现代化进程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首先,中国与非洲之间的一个明显的不同,就是在一定时期内,中国或多或少已经成为中国人民所认同的统一的祖国。正如我们提到过的,中国的首次统一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完成,之后又经历了多次的分分合合。但是统一这个目标仍旧是中国社会和历史的推动者和变革者心中所一贯追求的。统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强有力的号召力来源,并使中国人民以专心而坚定的姿态紧密团结、共同奋斗。对非洲而言,目前还不存在统一。在我们的有生之年,统一进程将缓慢得到推进。殖民者为了其自身的帝国主义利益,在撤出后留给非洲的是总体上分裂破碎的状态和作为帝国主义利益守护者的当地精英阶层,这些情况都是十分复杂而令人困惑的。推进统一的道路需要从根本上否定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带来的地缘政治遗产。在意识形态方面,这场运动可能需要一场由知识分子领导的类似于“五四运动”的群众运动,将实现统一的调查分析、途径和战略置于议程之中。非常重要,民族意识和民族意识的培养对非洲将来的道路是决定性的。后殖民或者新殖民的国家已经误导了非洲民族主义的发展进程,在其影响下非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认同和民族意识仅限于一国国内,而并没有扩展到整个非洲。作为一种文化和历史的经验,非洲观念需要超越新殖民国家的国界,而这是一场需要全力以赴并取得胜利的战斗。否则,非洲的统一仍然会继续受到误解。我们将更强调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在这个阶段最可行的途径就是进行一场社会运动。

统一将使非洲形成一个庞大而开放的国内市场,就像中印两国现在已经做到的那样。欧洲也正在追求相似的目标,而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开放的市场,并试图将这一市场扩展到加拿大和墨西哥。显然,非洲的新殖民的分裂状态并不是一个有利的辅助因素。从经济上看,除了南非之外,这些国家中可能没有一个能够维持生存。因此只有非洲国家迅速达成统一,经济发展才可能有一线希望。

与统一的国内市场建设密切相关的是资本的积累,而这一过程对进行大规模投资和资本化至关重要。在当今世界,积累对发展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工业十分重

要。为了使非洲能够在这个领域进行竞争,各国应该支持建立能够推动积累并有助于资本、劳动力在非洲大陆内部自由流动的机制,就像中印两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做到的那样。无论再怎么强调积累因素都不为过。

在革命运动前的中国,军阀主义是十分普遍而有害的。中国从军阀混战状态到革命进程的转变过程很值得非洲学习。目前,在非洲大陆上,很大一部分非洲国家都处于不同程度的武装冲突和军阀混战之中。实际上,更大一部分的非洲国家今天正面临着低强度战争或者高强度战争。中国在军阀混战方面的经历以及如何结束军阀混战状态方面的经验,对非洲来说是十分宝贵的。1963 年,周恩来在对非洲进行历史性的访问时,曾经说过非洲进行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当时在非洲内外很多人都觉得这个论断不合时宜,现在则有很多人赞同这个论断。

从历史上来讲,我们无法否认中国共产党为推进中国走向现代而提供了决定性的意识形态和实践的力量。现在,我们可以对 20 世纪世界上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提出批评,但是毫无疑问,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使现代中国成为可能。中国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的理性锋芒运用于其具体的现实之中,在长年的战争之后成功地推行了现代化这项国策。尽管中国共产党将来如何发展还只是人们的想象,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今天所取得的成就却是有目共睹的。

在 20 世纪的非洲,共产党在政治运动中并不突出。但是众所周知,南非和苏丹并非如此,这两个国家出现了共产党组织。在非洲的其他地区,所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方向的政党从不披挂共产党的外衣。这样的政党在喀麦隆、塞内加尔、几内亚、贝宁、津巴布韦、加纳(恩克鲁玛统治后期)以及尼日利亚都出现过。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和 7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尽管非洲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很强的学术性,但是依然十分流行。我在即将出版的《非洲国:国家状态》(*The African Nation: The State of the Nation*)一书中,重新回顾了那段马克思主义颇为流行的历史。大多数非洲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哲学上都曾受到苏联及其卫星国、中国或阿尔巴尼亚和朝鲜所灌注的倾向的影响。各自独特的马克思主义的表述极少单纯地为非洲着想,或者切合非洲社会的实际情况。它们往往不切实际,不负责任,因而思想的“清晰”往往取决于语义、逻辑以及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断章取义的能力,而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已经成为终极的检验标准。这种情况适合那些脱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其“清晰”几乎或根本无须实践。对许多人来说,苏联的垮台意味着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垮台。他们是如此拘泥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以致苏联垮台后他们都无法继续生存了。在利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导解放运动的领导人中,最具理论性的来源可能是几内亚比绍的卡博·韦尔德(Cabo Verde)和阿米尔卡·卡布拉尔(Amilcar Cabral)。1966 年后,恩克鲁玛在流亡中逐渐回归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具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民粹主义是声称坚持马克思主义方向的这些人的最为普遍的立场。

在其他例子中,如苏丹,共产党的经历曲折坎坷。在一个绝大多数民众是非族人的国家,它是不折不扣受苏联所感召,是泛阿拉伯主义的。在南非,共产党的领导人主要是白人知识分子,他们公开宣称信仰马克思主义,却往往更倾向于自由主义。在历史上,南非共产党厌恶泛非主义(占多数的黑人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表达),从第三国际开始,南非共产党就回避认真考虑非洲社会的特点,并进而畏惧“本土共和”(“Native Republic”)的观念。“本土共和”这个词表达的立场是南非的转型必须首先考虑建立一个“本土共和国”,以增强民族民主革命的社会基础,从而创造为社会主义斗争的基础。苏联马克思主义令人窒息的后果以及对泛非主义的恐惧,从未对强化民族民主革命的社会有所助益,并使一些人产生了这样的念头,即回避民主革命以及“本土共和”,从殖民者—殖民主义一步跃入社会主义是可能的。因而,由于对“本土共和”的恐惧,他们最终沦落为托洛茨基分子的同伙。

在南非,一直有一股强大的托洛茨基主义传统,尤其是在西开普省。他们特意打着统一运动和同盟组织的旗号来运作,并在回避承认南非压倒性的非洲特征的情况下,就已经在憧憬社会主义了。写到南非共产党,本尼·邦尼泽(Bennie Bunsee)正确指出:“部分问题在于他们大多是其白种人、印度人和其他有色人种,虽然主张进步,但他们从来都不是非洲人。他们带来的是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适应南非和非洲的实际情况。其主要的理论贡献——如果我们可以称之为理论贡献的话,就是他们借用的‘国内殖民主义’(‘internal colonialism’)理论。这一理论实际上澄清了南非国内的殖民问题和民族问题,其马克思主义的标签与苏联的每个波折纠缠在一起。南非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呆板固执而又泰然自若的斯大林主义的政党。”^①

中国的独立和中苏两国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态度的歧异最终使中国获得了成功,而苏联则遭到了失败。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而不是走苏联人所建议的道路。^②众所周知,无论是否奉行马克思主义,只有保持思想和行动上的独立,并且让我们的思想与非洲现实的特殊情况紧密结合,才能从长计议,为非洲带来希望。

我们在学理上已经对自力更生这一概念做了许多探讨。1960 年代以来,观察家们认识到中国十分重视自力更生这个观念。在非洲,我们认为自力更生可能最坚持不懈的反响是来自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领导下的坦桑尼亚。然而,这一观念在非洲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卡塞利·海福德(Casely Hayford)、杜贝(Dube)、贾巴鲁(Jabavu)和斯莫尔(Small),都各自强调了自力更生的贴切和必

^① Bennie Bunsee, “SACP’s True Colours Are Revealed in Its Support for Zuma”, *Cape Argus*, Cape Town, 1 November 2005, p. 14.

^② See Hélène Carrère d’Encausse and Stuart R. Schram, *Marxism and Asia: An Introduction with Readings*, London: Allen Lane, 1969. 这篇文章强调的是中国式马列主义的亚洲中心思想。

要。这种论点的精华之处在于:我们应该依靠自己的能力、力量和资源进行发展,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才真正是最终拯救自己命运的人。除了非洲人民,没有其他什么人能够解放非洲。我们尤其应当注意的是,尽管西方殖民国家应该为我们在过去几个世纪中的不发展负责任,但是我们不能寄希望于我们的发展和解放得到这些国家的精英分子的援助和减免。

二

需要得到理解的是,非洲解放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语言因素,或者更为重要的是读写能力。从语言和读写能力发展的历程来看,中非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注意到这一点不无用处。诺斯(Nourse)告诉我们,中国人民社会生活的转变和政权变化是与一场复兴同时到来的。在 18 世纪满清统治初期,中国发生过一次思想复兴,但那是纯学术的。之后到了满清统治后期,中国出现了另一场复兴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敢于反对过去的礼俗而批判经典,并把孔子也说成是个改革家。他们这些改革家影响了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也影响了百日维新法令之后的思潮。在随后而来的反动中,保守的士大夫阶层充当了急先锋,维新派的书籍遭禁。在 1898 年的戊戌变法中,批判经典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对圣人的亵渎。仅仅 20 年后,第三场、也是更为成功的运动到来了。在 1898 年遭禁的书籍重又出版发行,当时的许多学者认为其中的革命观念十分温和。五四运动中的新文化运动“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①

这种批评和质疑的新精神促使学者们开始思考另一个问题,即中国未来的文字语言问题。在这一方面的第一人很可能是黄远生。他在 1915 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他提到应该在中国思想中灌输整个世界的思想。不仅如此,他认为这类思想需要得到推广,并使民众能够接触到,而不仅仅限制在有限的受教育阶层。为了在群众中间传播这些思想,他赞成采纳简单明了的书面文字,以代替古旧的艰涩的书写文字。他指出,在欧洲的文化复兴运动中,作家们放弃使用拉丁文而改用本国语言、人民群众的日常语言进行写作,这一过程对推翻欧洲中世纪的统治制度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向中国的普通民众介绍世界思想和西方知识的建议面临着一系列棘手的问题。首先,人民群众缺乏阅读能力,进而经典的书面语言——文言文与口语相差太大。文言文“被压缩至最简,每个字或是两三个字就代表了一整个句子的意思,只有浸染于经典学习的学生才能从书中看出点门道,而掌握这门隐讳的

^① Mary A. Nourse, *The Four Hundred Million: 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Third Edition), New York: The New Home Library, 1943, pp. 298—299.

语言需要多年苦学。”^①解决的途径就是从文言文中借用文字,但遵循日常口语的表达形式。之前好几代的士大夫和其他特权阶层都认为白话文十分粗鄙,从而拒绝使用白话,但是此时出现了许多大胆的观点,主张旧的传统的文言文即将衰亡,并号召应该以已经被剧作家和小说家所成功使用的白话文取而代之。他们声称小说的语言有能力成为未来中国的文学语言,实际上唯一的障碍就是士大夫阶层不认可使用这种文字。一个更加自负的团体坚持,抛弃旧文学是十分不幸的。不仅如此,这些顽固派还声称因为中国方言众多,只有文言文才能成为所有受教育的人们能够理解的语言,同时认为文言文比白话文更加高雅。^② 在当今的非洲,这种语言文字上的争论也有重大的教育内涵。

有趣的是,到 1917 年白话文运动就已经得到发展和普及。越来越多的作者在上海的现代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出旧文学已经失去了抵抗能力,并赞扬使用各种流行的白话文进行表达的作者。十分重要的是,这场进步运动由国立北平大学领导,并迅速传播到各个省份。正如保守势力所正确指出的,文言文是受教育的人们的共同语言,因而发展一种全中国统一的语言文字面临的困难依然很大。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很多方言的国家,以白话文写作并不能产生一种通用的语言。因而,多种方言口语的存在,就必然会导致多种白话文书面用语的出现。所以面临的问题是:应该将哪一种方言作为中国的国语?摆在前方的一条路是:由于中国的首都通常位于北方地区,因而北方方言早就被认为是官方语言,亦即大家所知的北京方言。中部和西南部的方言虽然与北京方言有不同之处,但也较易懂。唯独东南地区的方言不能被中国其他地区的人听懂。由于十八个省份中将近百分之九十的人们都能听懂北京方言,所以决定采用北京方言为国语,作为全国文学、教科书和学校教学的标准语言。^③

这个划时代的决定打开了思想的闸门。此后,使用白话文的报刊在全国各地纷纷出现。到 1920 年,这场运动的势头已经如此之大,以至于教育部命令小学的一、二年级应该教授现行的国语。8 年后,国民政府宣布在所有的中学系统中废止一切文言文教科书,而只有那些“国语”教科书方得刊行和使用。当许多成年的学生因此将他们的注意力从政治转移到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其他的学生对政治问题产生了狂热的兴趣。自从日本作为一个东方国家在日俄战争中取得胜利后,为了

① 19 世纪著名的英国外交家欧内斯特·萨托(Ernest Satow)曾在日本生活多年,并在 19 世纪 60、70 年代多次访问中国。有趣的是,他在其自传中写道:“当我在北京时,一次维多利亚主教在公使馆逗留,在公使布鲁斯先生缺席的情况下,主教邀请一些学生共享晚宴。席间人们谈到了有关中国人对于智识力的研究能力的问题,主教先生问到我们是否认为这种能力可能会受到单调而无效的学习方式的影响。至少,主教从自己的经历中认为这是有影响的。尽管我们需要谨慎地对待这一论断,但是主教的谈话内容确实确认了该论断。”See Sir Ernest Satow, *A Diplomat in Japan*, New York: IGG Muse, Inc., 2000. p. 15.

② Mary A. Nourse, *The Four Hundred Million: 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 299.

③ Ibid., pp. 299—301.

在这些国家中找寻国家强盛的秘密,成千上万的学生奔赴日本、欧美留学。这些不成熟的青年学生在获得学位后马上回到祖国——一个读书人拥有特权的国家。他们总是唯一有资格坐在办公室里的人,因而在乡下人的眼中具有很高的声望。旧的科举制已经废除,因而拥有日本和西方大学学位的学生自然认为他们是旧式读书人特权的继承者,并且作为他们的权利要求得到任用。同样,人民群众自然会给这些学生以尊重,这是中国的读书人向来所得到的。^①

因而,我们很容易发现,中国的经验以及语言、文学和大众社会之间的交汇,与非洲的有着天壤之别。中国在协调一致的语言形式的基础上普及了读写能力。将日常口语的地位提升到一种发展的科学的语言的高度,其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在非洲,现阶段我们的日常用语推广的速度很慢,这一局面在未来也不会有多大变化,殖民地语言的至高霸权仍盘桓不去。精英阶层的文化基础就是殖民地语言,而他们在文化方面获得的权力是建立在他们掌握殖民地语言的基础之上的。由于精英文化以殖民地语言为基础,大众文化则是以本土的非洲语言为基础,因此二者之间不可避免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所以显而易见,在文化层面,精英文化代表了新殖民文化或者帝国主义文化的扩张。为了为民主的文化建设创造基础,非洲人民需要在大多数人使用的语言的基础上寻求发展。非洲人民的解放需要建立一个切实可行的文化框架,由于少数非洲人的文化和语言都来自旧的宗主国社会,当然上述文化框架不可能建立在这少数人运用的语言之上,但是显然他们使用的语言不能够在构建共同语言的过程中受到压制。

总之,只有取得废除殖民地语言、推广非洲语言的斗争的胜利,才能实现非洲人民的解放。在坚持这个信念的同时,还要坚持其他正字法和拼写系统的修订,以使得同词源、同语音的语言形式的拼写能够一致,这样就扩大了读写能力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基础。没有读写能力的提高,就不可能会有非洲的发展。我们所说的读写能力应该植根于非洲人民的语言之中。

(蒋华栋 译)

^① Mary A. Nourse, *The Four Hundred Million: 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 302.